

台盟的民主建国之路

□ 孙信

民众以各种形式抵抗日本侵略者。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许多台湾青年奔赴祖国大陆，投身抗日战场，同大陆同胞并肩战斗，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台湾人民刚刚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又陷入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之中。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台湾工厂关闭、农地荒芜、物价飞涨，台湾民众苦不堪言。1947年2月27日，国民党缉私警察在台北街头收缴烟摊并殴打女烟贩，在同围观群众的冲突中射杀了一名市民，制造了“缉私血案”。28日，愤怒的台北市民举行起义，起义民众通过电台控诉军警的暴行，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同时进行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斗争”；台中地区在谢雪红等人领导下，夺取地方机关，组建“二七”部队，与敌人展开激战。革命烽火迅速燃遍台湾省大部分地区，即台湾“二·二八”起义。面对台湾同胞掀起的革命风暴，国民党当局进行了残酷的武力镇压，屠杀群众达三万人，起义最终以失败告终。

台湾同胞反对国民党专制、争取民主自治的斗争，同大陆统战区的“反独裁、反内战、反饥饿”运动一脉相承。为此，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台湾的自治运动》，对起义给予了肯定和支持，指出“台湾人民的武装自卫是被迫的，是必要的，是正义的，是正确的”。血的经验教训使“二·二八”起义的领导者深刻认识到，要争取台湾人民的解放和幸福，必须组织一个能够团结台湾人民和各界人士的政治团体，同全国人民共同奋斗。在中共的帮助下，在大陆的台籍革命人士李伟光等同志的支持下，撤离台湾并转至香港的谢雪红、杨克煌联合苏新（原台湾《人民导报》总编辑，因“二·二八”后被通缉）着手筹建台湾革命组织。

1947年11月12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筹委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在香港举行。大会确定组织名称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通过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纲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筹委会第一次会员代表会文告》《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筹备会时局口号》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章程》，提出了一系列反对帝国主义、官僚主义、封建主义、争取台湾解放、民主和地方自治的政治主张。《纲领》第一条规定：“设立民主联合政府，建立独立、和平、民主、富强与康乐的新中国。”《章程》第三条规定：“本同盟以实现台湾省之民主政治，及地方自治为宗旨。”《纲领》和《时局口号》都提出“打倒独裁统治，实行人民民主制度”“撤销政治警察、经济警察、秘密警察及一切特务机关”“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美军退出中国去”等政治主张。大会推选谢雪红、杨克煌、苏新等人为台盟负责人，宣告台盟正式成立。

反对“台独”阴谋 响应“五一口号”

台盟成立之际，正值“联合国托管论”甚嚣尘上之时。以廖文毅为代表的托管派认为国共的斗争是长期的，台湾的解放在此情况下仰赖共产党是不可能的，所以希望借由美国的力量赶走蒋介石政权，脱离中国。对此，台盟旗帜鲜明地予以揭露和批判。台盟将原“新台湾出版社”改为自己的宣传机构，先后出版了《新台湾》《胜利割台湾》《台湾人民的出路》《愤怒的台湾》等书刊。同时它借助向国内外投寄文章、通讯、报道等方式，一方面，揭露国民党蒋介石和美国企图分离台湾的阴谋，与廖文毅所组织的“台湾民众联盟”及廖文毅、廖文奎兄弟在美国扶持下于香港建立的“台湾再解放联盟”作斗争，对台湾托管、台湾独立言论给予坚决的回击和批判；另一方面，向台湾人民介绍大陆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情况、战局发展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号召台湾同胞团结起来，配合人民解放军早日推翻蒋介石集团的统治，实现祖国统一。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7日，台盟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在这时候，中共中央发表了这个号召，正切合全国人民目前的要求，也正切合台湾全体人民的愿望，无论任何政府的产生，必须建筑在全国人民的共同意见上，即必须能够真正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南京政府之所以‘非法’，是因为它代表四大家族和少数官僚集团的利益，而不是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中共中央这次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样的政府才是个真正合法的中国政府，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同胞们，赶快起来响应和拥护中共中央的号召，配合全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广泛地展开反对对美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台湾分离运动的各种斗争，准备参加‘政协会议’‘人民代表大会’和‘民主联合政府’，这样，台湾人民才能由美蒋联合统治的痛苦中解放出来！”

台盟以实际行动支持人民解放战争，为解放全中国而作出诸多努力。1948年5月25日，台盟以发言人名义发表了反对美帝扶日政策的声明；11月8日，以台盟名义致电中共中央，祝贺东北完全解放；1949年1月17日，台盟发表声明，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并表示在台湾未解放前不能说已取得全国胜利，必须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7月7日，发表纪念“七七”通

电，号召台盟要配合解放军解放台湾。与此同时，台盟派出许多干部到各地宣传新政协与台湾的关系，开展新政协运动，邀请台湾各人民团体中的进步干部和各界人士，召开座谈会，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

参加新政协会议 携手筹建新中国

1949年3月，为参加新政协，台盟总部负责人谢雪红等离开香港来到北平，台盟总部也由香港迁到北平。

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举行。台盟总部负责人谢雪红以中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的名义参加了筹备会。在当时，台盟是一个地方性政治团体，但考虑到台湾尚未解放，还需要对台湾同胞做工作，会议协商决定台盟作为一个党派单位参加新政协。正如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周恩来在向政协代表报告政协代表人选协商情况时指出的：“凡是去年‘五一’前就建立了组织或已开始建立组织，并且很快地响应了‘五一口号’的，就可以作为参加单位，现在参加筹备会的十四个党派单位都是按照这个标准决定。其中有三个单位……需要做些说明……台盟是一个革命的组织，‘五一’前就从事台湾人民的解放运动。”至此，台盟由一个政治团体转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的一个政党。

台盟推举谢雪红、杨克煌、李伟光、王天强、田富达为正式代表，林铿生为候补代表出席第一届全体会议。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9月23日，台盟首席代表谢雪红在全体会议上发言，她说：“这次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以及由这个会议将要组织起来的中央人民政府，将要宣告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完全根据中国人民的要求和利益而产生出来的。670万台湾人民，300多年来反对荷兰、西班牙、日本等异民族的侵略压迫，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封建买办统治，不断作流血牺牲的斗争，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全台湾省人民完全拥护这个全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完全支持这个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并完全同意这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

10月，遵照民主党派与中共的协议，台盟宣布撤销原有纲领，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作为自己的纲领。从此，台盟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走上了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的历史道路。

民主党派与民主建国道路

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进行伟大斗争，以辩证的科学方略展开伟大斗争，准确把握斗争的时、度、效，能驾驭斗争主动权，取得了卓著成就，抗住了大风大浪的冲击，使党和国家面貌焕然一新。尤其是积极谋划并实施一系列新的国际国内战略构想，譬如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中国制度性话语权，建设“一带一路”，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坚决维护南海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等，为进行伟大斗争赢得了先机、作足了准备、积累了经验。

以时代发展、实践经验和理论储备为基础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际上就是指导伟大斗争的科学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历史方位、民族复兴、人民中心、发展理念、战略布局、战略安排、强军战略、国际战略、深化改革、党的建设等，都作出了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对进行伟大斗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就是说，在新的历史方位，担负起实现伟大梦想的历史使命，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参与全球治理，建设“一带一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把中国共产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等，都有助于我们进行好伟大斗争。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一级教授〕

曲折问世的《明史》

□ 陈晓华

夷夏之防与文化认同

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为前朝修史，虽然不止满清一族，但满清却是至少做足了兢兢于满汉一家的表面功夫，稳坐江山的时间是较长的。在表面功夫下，也确实诚心融入汉文化中，虚心向先进民族汉民族学习。而对汉族官员和知识分子，清统治者系前朝怀旧者于馆阁，赐以高爵厚禄，责以编书之任，耗以年月，固其心志，这种羁縻于字里行间的老英雄术，又是他们尤为深谙的。自入关，此策略更是被奉为主臬。在此利器辅佐下，他们开馆修了《明史》等史书，化解夷夏之防，在建立起文化认同的同时，也获得了中华文化续命者的地位，修成正统。因此，典籍图谱对清政府的意义非同寻常。

“国可亡，史不可亡”，文化不灭，国等同再生。因《明史》之修，竟使夷夏之防甚坚、立誓终老遗民之心的顾炎武、黄宗羲也动了心。他们虽然没有亲自出山修史，但顾炎武曾就《明史》事与在明史馆的外甥徐乾学、徐元文有过书信往来。黄宗羲的儿子黄百家、门生万斯同、万言入馆备顾问。而正因为黄宗羲的建议，不仅有徐光启主持编撰《崇禎历书》的成就，而且其余人等融会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成就也得以见诸《明史》。当然，这也累及到顾炎武、黄宗羲二人的遗民身份。

清政府因《明史》之修，却收获满满。那些怀念故国满脑子夷夏观念的明遗民，多私作有明代之史，字里行间充斥着对清政府种种不良行径的控诉。为此，还曾引发一场清初最大的文字狱，即康熙二年（1663年）因私自编修《明史》而罹难的庄廷鑑《明史》案。与其任这些文字泛滥，不利自己统治，不如自己站出来，以明政府合法继任者身份，肩负起修《明史》之任。既堵住了悠悠众口，又传承了文化，向天下宣示自己正统继任者地位，促成全民文化认同，从而走向政治认同。《明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修撰的。清政府因此成为最大赢家。

康熙十七年（1678年）开博学鸿儒科笼络网罗天下士人不肯入教者，纷纷因《明史》之修而出山。并且，清政府自己可以总控全局。故而，虽然有万斯同等主持修撰大局，力求实史，但体现的却是清政府的意志。借助《明史》之修，清政府给自己塑造了为明政府报仇雪恨、歼灭“流寇”的形象，并完成了自己“文期共喻，扫残深鄙秽之言；事必可稽，黜荒诞奇邪之说……胜国君臣之灵爽，实式凭之；累朝兴替之事端，庶几备矣”的期许。

历四朝而成

不过，《明史》纂修多舛。顺治年间，国家初建，诸事繁杂，战乱频仍，无有全面撰修环境。康熙四年（1665年）虽得以重开，但因纂修《清世祖实录》而停修。到康熙十八年（1679年），官军收复湖南、广西，平叛虽取得阶段性胜利，但三藩叛乱并未平定，京师等处又发生强烈地震。人心不稳，四海震动。康熙为此发布了罪己诏。这时，如重起《明史》之修，可起到稳定人心、安抚海内的功效，康熙于是下旨以徐元文为监修，重开明史馆。从此，《明史》纂修获得了正式的钦定身份，无旨纂修的局面结束了。

但康熙此后，还需要继续收拾三藩熄灭战火、收复台湾、平定准噶尔叛乱。而硝烟过后，还有朋党之忧扰攘朝堂。故而，《明史》未能告结，但《明史》雏形却具备了。至于雍正，在位时间短，整饬朝纲几乎占据完他在位时间，《明史》自然也不可能在他手中间世，但为之所做修订工作为乾隆朝定稿奠定了基础。最后，国泰民安，人力物力财力大备的乾隆朝，完成了《明史》纂修大任。

当年，最后修成《明史》的乾隆朝明史馆臣为尽快保质保量结束持久战，献礼本朝，他们并不斤斤计较于康熙年间传下来的明史稿作者的归属权问题。作者是万斯同还是王鸿绪，

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部“首尾略具，事实颇详”的史稿，为他们撰修的凭借。在他们看来，有因袭之嫌的《汉书》《新唐书》在前，只要是非不谬，有利于修史大局，何惧因袭嫌疑。

至于如何书写明史，康熙、乾隆都曾下旨要求不必因顾忌当朝，贬斥之，一定要表彰忠义，“南明诸藩”更不得加以伪字。康熙希冀修成的《明史》是一部可以供天下人检验的良史，所以他要求告成后，与明时所修的实录等诸书一并颁发天下，任由天下后世公议。

不过，颇具传奇、曲折告成的《明史》，最初，清政府并未下明确修书的诏令。亦即，《明史》纂修，其实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当初，清统治者忙于一统江山，虽然意识到修《明史》重要，口头有谕，但分身乏术，并且当时本不具备纂修的条件。然而，复杂纷乱的局势，需要一部前朝史来调解各种关系，因此各方力量对纂修《明史》或多或少有所期许，《明史》之修势在必行。于是顺治二年（1645年）内三院大学士冯铨、洪承畴、范文程、刚林等上奏“钦奉圣谕，总裁《明史》”，并由他们提出副总裁及纂修人员等名单，并设收掌官、满学誊录、汉字誊录。在此情况下，清政府要做的就是顺应要求，欣然接受，开馆修《明史》，终成依本纪、志、列传、表，叙述自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至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年），共三百三十二卷的《明史》。

功过是非

《明史》之修前后共历顺康雍乾四朝。聚于其中者都是大儒名家，蓄几十年功力而发，加以清政府的高度重视，使之编纂得法，体例妥帖，材料翔实，行文简洁，在诸史中记载最为完善。而它表彰忠义，歌颂明人成就与贡献，揭露明朝利弊，讲明兴替缘由，确定备千秋法成。

它追溯明室之亡起于天启，指出明创业守成卓然有可观之处，灿然大备典章文物之观，但后继者不遵法。到末流，则权或移于阉寺，无治人以行治法，外忧内患，因灾氛以启寇氛，文累武弊，朝纲不振。而士大夫，自明神宗之后，衰于门户，流于清议，争一时是非，不顾大局。

此外，它尊重史实，纠明代官定史论之偏。如对建文帝、懿文太子、景泰帝、兴献王都做出了以史实为据的恰当处理。在类目上，艺文志只著录有明一代典籍，开断代艺文志先河。《历志》增图，提升了历法的可识度。于表所创设的《七卿表》与同是创设的阁党、土司、流贼三传，都是当时国情的实录。当然，污蔑农民起义为“流贼”，并告诫天下“剿抚之失，足为炯鉴”，实为败笔。而外国一传，虽为成例，但意识到中西之间交往从此开启新篇章，尤为有识。不过，把称为鞑靼的蒙古视为外国，却不当。然而，遗憾的是，系于清政府主持修撰，留下不少为清政府避讳之笔。如建州时期的历史、南明史事、对明人的屠戮掠掳等。

历史倏忽，光怪陆离比比皆在。中国士人都热烈望主修一部史书，青史留名。因为《明史》的纂修，中国历史多了一段王鸿绪掠夺万斯同成果的公案。为故国续脉，遵师命与修《明史》的万斯同以平民身份襄助。康熙三十年（1691年）所完成的416卷初稿，大部分出于他的手，但后来刊印面世的明史稿却只有王鸿绪之名。当然，万斯同草创之功巨大，王鸿绪也有修订之劳。乾隆君臣对这起公案采取的态度是只管成果，其余缄口不言。而倡议并主修《明史》的冯铨、洪承畴、范文程等，中间为《明史》大费心力的徐元文、张玉书、王鸿绪诸人，都未得题名。并且，更出乎意料的是，倡议且兼首任总裁的冯铨、洪承畴竟被乾隆点名列入《钦定国史贰臣表传》。最后，站在他们肩膀上的张廷玉得以题名其上，几等于坐享其成，轻松摘冠，千古留名，人生赢家。不可不谓造化弄人。

经史窥望

（上接1版）

在“四个伟大”整体框架中深入理解伟大斗争的精神实质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必须建设伟大工程，必须推进伟大事业。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就是说，“四个伟大”是一个有机整体，不可分割，必须统一起来理解。要深入理解和把握伟大斗争，就必须把它放在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整体框架中进行。离开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就难以深入把握伟大斗争的实质。

第一，建设伟大工程，必须进行伟大斗争。

进行伟大斗争与建设伟大工程相辅相成。进行伟大斗争是建设伟大工程的基本路径和方式，进行伟大斗争也需要建设伟大工程来引领。一方面，当前我们正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本质上是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这意味着要进行自我革命，就需要全党通过进行伟大斗争来进行，只有通过进行好伟大斗争以建设好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才能把中国共产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才能使我们党更好经受住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更好战胜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另一方面，越是进行伟大斗争，就越需要伟大工程来引领和保证，如果没有坚强有力的党的领导，进行伟大斗争就会偏离正确政治方向，伟大斗争也无法顺利进行。因此，为了保证伟大斗争取得成效，必须建设好伟大工程。

第二，推进伟大事业，必须进行伟大斗争。

伟大斗争是由伟大事业决定的。越是伟大的事业，越是充满艰难险阻，越需要进行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是人类历史上辉煌灿烂的伟大事业，是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的具有开创性的伟大事业，是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事业。在这一过程中，要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就要与各种难以想象的矛盾难题进行斗争，与传统的落后观念和思想阻力进行斗争，与各种诋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错误言行进行斗争，与党内各种腐败现象进行斗争。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主义进步，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就必须进行伟大斗争。

第三，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

伟大斗争。

实现伟大梦想不是一蹴而就的，实现征途上必然会遭遇各种矛盾难题、艰难险阻、风险挑战，只有积极进行好伟大斗争，破除这些矛盾难题、艰难险阻、风险挑战，才能实现伟大梦想。如果说实现伟大梦想过程就是进行伟大斗争的过程，那么实现伟大梦想则是进行伟大斗争的结果。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的过程，就是进行伟大斗争的过程。离开伟大斗争，伟大梦想是难以实现的。在新时代，全党要继续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确保伟大梦想如期实现。

以科学理论指导伟大斗争

越是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就越需要靠伟大斗争来攻坚克难；越要进行好伟大斗争，就越需要科学理论来指导，缺乏科学理论指导，要取得伟大斗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坚韧不拔的战略定力对待伟大斗争，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智慧谋划伟大斗争，以“明知山有